

文本沙漠 情感绿洲

Stevan Harrell 李星星

(2010年7月)

文本沙漠：通过分析缺乏了解人类学研究者与“对象”关系…… (2010.7.13)

今年是我第一次踏上人类学田野第四十周年，第一次踏上中国大陆第三十周年，第一次踏上凉山的盐源第十九周年，羊圈小学建立第十周年。

对于我来说，把盐源白乌溪上流（包括羊圈、偏水、猪厂、干沟四个村落）当为人类学研究对象的机会、发表和出版的机会其实很多。早期发表的文章也不少，包括与马尔子、巴莫阿依合写的回忆录《田野关系》的一篇，专著《中国西南族群的各种方式》的一篇，还有关于小学教育的一篇文章等等。奇怪的是，最近所发表的文章很少，而且不算人类学的作品。内容跨学科，主要以地球科学为主，尤其是森林生态和地貌学。田野笔记本有不少册写满地方历史、宗族谱系、宗教仪式等人类学的内容。应各国大学的邀请讲最近田野的内容，大部分都包含白乌上流人类学的内容，以民间传统生态环境知识为主。也有关于羊圈小学历史的文章和讲座，主体是办学所遇到的障碍、困难。但是，真是的、比较纯的、古典的人类学，如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等，却不见于近年的作品。

不久前，与同行人类学家、长期好友、羊圈小学建立同仁李星星教授也提了这个问题。李氏也表示，他虽然近年作品多，有藏族、羌族、尔苏人、汉族各个地方群体的民族史及人类学的内容，他同样关于白乌上流的作品稀少，甚至与我一样，只有零碎的一些东西，不算正式的人类学分析。十年交流以后，每年至少一次访问白乌上流地区，为羊圈小学付出不少工夫，包括募款，建立“凉山教育促进会”非政府机关来提供毕业生的奖学金，补助代课老师的工资等，当学校的顾问，可以表示我们对此地区颇有知识，颇有经验，而且知识和经验都很理想地适合人类学的分析。除早期（1970—80年代）台北县三峡的研究基地外，对于白乌上流的经验可算40年间所调查的点当中最丰富、最深入、最适合于人类学的分析。关于浙江萧山、攀枝花迤沙拉的作品早就产出了，对这两个点的认识其实比对白乌上流的认识少得多。然而对白乌上流为什么没有任何人类学的学术成果？为什么出现了“文本沙漠”？

从各种方向可以寻找“文本沙漠”的原因。一个可能性在于知识不够。这个方向的思路曲折，有时难找方向，需要一步一步走。路径可能开于语言。把白乌上流语言情况和三峡来比，区别很明显。三峡的研究，在一个村落呆了将近一年，其中半年一个人住，没有助手，没有翻译，家人回家了，单独“阿啄仔”（老外）一天到晚讲90%的闽南语，只有一小部分时间说普通话或英语。这种语境，进步确实很快，半年以后基本上毕业了，有三四个老头坐在一起聊天，我能百分之百听懂。恐怕那时的语言水准以后就成为个人的标准，凡是达不到那个标准在心里头就认作是失败，但又不承认，对于学术同事门假装有语言资格来作白乌的研究。其实，一直从39岁开始，陆陆续续努力学习诺苏语言，不只一次请老师帮忙，每次去凉山尽量努力跟人说当地话，并无疑的一年比一年有稀少的进步，增加词汇，加强听力，改进语法。2006年去羊圈小学，因上一年与尔古阿支老师合作翻译“科普之尔”“比摩特依”，村民吃惊的发现我语言真有进步。但是，现在为止学习诺苏语言的工程失败了。只能说简单的、简单的对话，两个诺苏聊天，基本听不懂，问比较复杂的问题，或问不出来或很别扭的吐出一堆动词名词，万一对话者听懂，肯定回答起来太复杂，需要翻译或只能了解一小部分。同时，在彝学界我的名誉传遍四方，美国木嘎会说彝族话，其他“海底虫”（彝语汉文标音，意即外国人）都不会，让我感到更不好意思。但是死板的很，不敢放弃，一直希望有一天会说流利的诺苏语。

因此，每次作访问试图用诺苏语。而且，用诺苏语，说实话，除了练习学会之外还有另外三种原因：

其一为尊敬。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原则包括各民族平等，应该互相学习，互相帮忙，包括互相学习语言。但事实上汉族说彝族话是苏铁开花，常说而罕见。原因可能有各种，但是其中肯定有“少数民族语言难学”、“汉族语言通用”、“何必学语言，万一有人不会汉语，随时可以找到人翻译”此种不尊敬少数民族的解说。因此，虽然语言不好，搜集资料有语言障碍，心里还有“应该争取”的感觉。

其二为个人骄傲性。虽然“美国木嘎会说彝族话”是夸奖的名誉，确实我学语言比一般人，包括一般人类学家，又快又容易。恐怕是为了保持“语言天才”的自尊性，一直尽量争取自我证明美国木嘎会说彝族话。

其三是，对于凉山的汉语方言的听力实在不理想。加上不少白乌上流人讲汉语不但带地方口音，同时也带诺苏的口音，结果常常是别人讲诺苏语也好，讲凉山的汉语也好，我听力同样的差。听不懂别人说的话，感到没有发言权，不应该扮演地方社会文化的所谓“专家”的角色。

不过呢，知识缺乏不限于语言或沟通的障碍。也有方法的两种缺点，一种可以怪学术制度与其背后的行政制度，一种恐怕只能怪自己。制度的障碍在我于《田野关系》中提到的“田野工作”与“社会调查”之间的区别。前者为西方资产阶级人类学的骨干原则，由马凌诺斯基的传说开始。据传说，马氏因为第一次大战时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是“敌国外地者”被统治者“家捕”（意即软禁）在特落彼岸岛上，不能回澳大利亚，只能留在岛上认真研究，并非故意发明“参与观察”的田野方法。之后每个攻读人类学博士的学生，必须按照马氏的先例长期蹲点，参与当地生活，学会语言，学会由本地观点观察社会文化。虽然后期研究者已经发现，连马氏自己也没有得到自己的田野标准，何况大多数他的继承者，他的理想标准仍然留在我一代的人类学家的心里，我们都认为，得不到马氏的理想标准就没有发言权。后者呢，“社会调查”产生于根本不同的学术和政治的环境。自从1950年代中国全国性的“社会历史调查”的大型工程，为了促进各地少数民族接纳入多民族大家庭，促进民族地区的革命与发展，两年之内需要把400多族群，后来被合并入55个少数民族。社会结构，历史发展的阶段，文化特点，都记录，分类、分析，提供为民族工作单位使用。如此短期记录那么多不同的社群、社区，当然无法在某一个点或少数几个点实行长期的田野，只需要发明和施行短期社会调查的方法。而我在白乌上流所作的即是短期的、加速的调查。笔记本记满是不能否定的，但是一直感觉缺乏深入。

另一种方法的缺点并不是体制的问题而是个人的缺点。就是不敢问，不敢追求知识，不敢打扰人家的工作时间或休闲时间，不敢插入人的生活。同时也害怕人拒绝回答我的问题，或胡说八道乱回答。因此迁就，不积极追求重要信息。这种毛病很多人类学研究者都有，连马凌诺斯基也不例外。甚至于蹲在帐篷，看小说，吃三明治的故事很普遍。当然，短期调查的例子不那么极端，但是同样的心里感觉也引起个人的胆小。胆子小，熟悉就舒服，结果过分依靠那些比较熟悉的人。在白乌上流熟悉的是老朋友马尔子的家属和亲戚，还有一些长期合作者。而且，虽然流域有四个村落，习惯住羊圈小学，羊圈小学不但立于羊圈一个自然村，学校附近的住宅就是那些人的住宅，加强了胆小的趋向。结果，不但我的视野受到那些人的过分的影响，同时很多人根本不认识，或如果面熟也很少与他们聊天，访问他们，求他们的看法。我的白乌上流视野基本上就是格布家族大房和他们的亲戚，加上一小部分二、三房的视野。因此感觉对于此地的知识，了解非常有限。

于此可见，任何人类学研究者假如受此两种知识的限制，很可能引起小心，或引起不自信，或引起发表为“专家”作品的障碍。但是知识不够，虽然是事实，却远不能全部解释“文本沙漠”。首先，如上所叙，除了70年代的三峡，对其他的调查点（也包括现在的三峡）的知识更浅，了解更不深入、不全面。相对来说，可以看到，白乌上流的知识还更深入、更全面一些。可能需要探索另外一条路径来寻找“文本沙漠”的来源。

进一步的探索可能开路于感情。

2000年，与马尔子、巴莫曲布嫫两位朋友于华盛顿大学博克博物馆举办“高山图案”诺苏文化展览，中国国内不少彝族学者、干部都听说了，包括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沙玛阿果。阿果一听到美国有彝族展览，就安排来西雅图拍片子，主题是我在凉山的工作，片名为“心系凉山”。确实“心系”和“客观”有矛盾。……其实，我对“凉山”的“心系”并不应该是分析或发表的障碍。不敢否定对“凉山”有一点认同，但是这个认同不足为发表的障碍。第一，虽然彝族同事们都认为我是“研究彝族文化”，甚至“帮助把彝族文化介绍给世界”，这本来不是我研究的目的。真正的了解彝族文化的专家只有彝族。我们外人的了解太浅太浅。我很原始的诺苏语言水准被彝族那样赞美只能强调内人和外人在了解文化方面的差异。作为人类学家，我对“彝族文化”的贡献只能从理论的角度，或从比较的角度来作出。我要写这方面的文章，唯一的障碍是感觉不够了解，还需要进一步考察研究，而与假设的“心系”毫无关系，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来不及作而已。

不……，我的感情不是民族感情，而是个人和地区的感情。写比较重要的关于凉山的作品那段时间，包括“西南中国……”，与白乌上流或白乌上流居民的“心系”——并没有发展到某种浓厚的程度。那时候白乌上流只是一个调查点而已，书上只是一篇的主题而已，一个能够当作比较资料的个案而已。但是通过魏明德和马尔子的交流开始谈到建立羊圈小学的计划，与白乌上流的感情开始转浓，与个人、与社区的“心系”开始发展。我记得1999年12月，展览展品的搜集工作基本上完成，与魏明德、巴莫阿依、李星星、马尔子访问羊圈偏水，学校的建筑已经开工，我们在坡上于冬天斜阳下吃羊肉、蜂蜜、饮啤酒，我跟魏明德用我很原始的法语说：“Presque trop doux”（几乎太甜），指者不但是蜂蜜，而是地方的未来和当地人对我们的感谢态度。我们想象的是能够更新地区、更新民族、更新个人与主流社会关系，来一次改天换地的更新。虽然十一年当中这个梦想慢慢失光，偏僻山地诺苏在主流社会上的困难只减少了一点，但是从那天开始，感情越来越浓，能够作客观分析的可能性越来越少。

接着一次去白乌上流是2000年9月，羊圈小学建校大典礼，与李星星同行。第一天晚上，李氏听当地的姑娘唱歌，问她的生活情况，发现家庭困难，生活条件恶劣，立刻决定把姑娘认为干女儿。同时我和李氏一起开始搜集人类学的资料。各个家庭的谱系、农业作物、人群迁移史等情况，都认真的写在笔记本里。之后连续10年，我至少一年去一次，每次都加上更多的资料，每次与教师、校长及其他顾问开会，谈学校的财政、教学、教师、设备等问题。2002年开始，带领跨学科的研究工作队伍，包括华盛顿大学、四川大学的生态学、植物学、考古学、地质学等学科的教授、研究生、本科学生来研究各方面的情况。有代表性而并不全面的研究清单包括：苹果种植失败的原因；杂交玉米引进对社会、经济、生态的影响；花椒种植与中国饮食文化繁荣的关系；当地人时间空间观，人的医疗方法选择（包括医生、自疗、毕摩等）；民族昆虫研究（包括昆虫标本）；牲畜发展与生态变迁；牦牛放牧业的发展；出外打工经验；村校合并与教育机会非均衡化等等题目。但是挂上我本人的名字只有三篇：一个关于并校和两个关于森林生态（一是关于退耕还林，一是关于生态的历代变化）的文章。而人类学的，尤其是“彝族文化”的，完全没有。

没有学术成果，并不是没有成果。除了当羊圈小学的顾问外，我与去过白乌上流的学生于2004年开始募款支持羊圈小学毕业生读中学的奖学金和补充代课教师的薪水，有时帮助“民办公助”的羊圈小学满足各方面经济任务。方法是设计日历，每个月用华大或川大师生所拍的照片，在国外义卖。第二年，为了满足美国法律对非营利组织的税务要求，成立了“凉山教育促进会”的非政府机关，以它的名义年益增加收入，增加奖学金的数量，以应付每年升级学生的需求，2011年有希望个别羊圈小学的毕业生可以升大学。

这样，一边增进积极的活动，一边增进深入的感情。每年去，好像回第二家一样。当地人，尤其是那群格布和格布亲戚，好像是自己人。每次踏上白乌镇到羊圈小学的路，心脏调速开始加快，忍不住不断地从汽车的窗户看外面，到了没有？看不看得到熟人？环境有无变化？如果带生人去，一直跟他们解释——那边是偏水，我们快进入羊圈，学校在前面，我认识那个人，刚才那个是我朋友……，与人见面，好久不见，身体好？今年收获怎样？一直想念你——用我粗陋的诺苏语言吐出。头一两天，“木嘎，来了多久，身体好，你很年轻”，过了

一个星期，“木嘎，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回来，你不在，我们心不安”。而且，什么都需要看。学校，人的房子，阿撒拉达河谷，尽可能去一次扎拉山看牦牛，看牧场，看无限的景观，冬天有雪山，夏天有青变黄的熟而快收的庄稼。

这些怎样分析？怎样变成资料？怎样写成客观的、中立的、有所谓学术价值的文本？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没感到压力，甚至一考虑就引起反感。客观化是不是非人情化呢？客观化是不是跟旧式马列主义民族学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一样带有对少数民族偏见的理论呢？客观化是不是为自己职业发展而利用朋友们、利用自己第二家呢？而且，说实话，人已经过了六十，职业压力几乎没有，已经赚了老人的自由。对于客观化，科学分析有反感，那就算了，可以不写。感情重于学术，具体工作重于分析。

但是，不那么简单。我认为以后会写不少东西。有微小的可能性，这些东西会包括“古典”人类学的分析。大一点的可能性是写关于传统生态知识的东西，可能是偏人类学，或更可能是跨学科的，把人类学和生态学加在一起，把对象的焦点从人转到系统。还更可能的是写记忆录，象把本文扩大，写成比较系统化的感受录。真实的参与观察方法可能需要首先通过养成个人“心系”、社区“心系”以后，才回到分析。但是此种分析绝对不能放弃所包含的感情。人类的科学化需要是一种承认人情的科学化，而不可能是规律化或客观化。通过养人情的过程，我们可以揭露假的科学，开始发明真的人文科学。这样“文本沙漠”才能绿化。这大概是我与白乌上流的十多年关系最重要的成果。

情感绿洲：人类学田野自省的情怀与回应……

(2010.7.20)

即将迎来羊圈小学建校十周年第一次校庆了。在厦门大学会议期间与斯蒂夫·郝瑞教授商议校庆日程，谈及需要一个科研汇报时，我颇有茫然之感。我在羊圈村活动足足有十年，可谈不上有什么科研成果。而且，似乎再持续下去，也难保证会有什么真正的科研。我本来以为斯蒂夫比我更有进取，哪知通过交谈他也与我有同感。我即想到，这个事实本身就该为人类学田野考察所关注。于是我说，我们的羊圈活动应该有人类学家把它作为研究对象来加以观察，不是我们去研究，而是我们需要被研究。同时我也建议斯蒂夫·郝瑞教授为此写点什么。郝瑞教授比我感受更多，竟想出“文本沙漠”这样苍凉的题名来表达实际并非苍凉的感受。

从我的羊圈田野经验来说，似乎时间越长越难实现科研的初衷。这在《蟹螺藏族》中可以读到。我曾用这种经验告诫学生，我说：“田野工作时间越短，越好写文章，而时间越长则越不好写文章。因为时间短，很新鲜，感受多、想法多。时间一长，发现未知的东西越多，发现的问题越多，事情越复杂，越难动手下笔。”我还曾告诉学生：同一个地方我每去一次都必定会有新的感受和收获，由此说明田野像一个无穷洞，身在其中时间越长越会受到无限的困扰。当时的感受似乎只是一个技术和能力的问题。

刚进入羊圈——就是郝瑞教授说的“白乌上流”这个田野，我与马尔子教授、郝瑞教授就设计了一个合作研究项目。我还经大家同意把这个项目介绍到了中山大学2001年“纪念人类学传入中国一百周年”的学术会议上。项目曾有这样的介绍：

我们作为人类学者偶得机遇来帮助羊圈村发展教育事业，实际已经参与到羊圈村现实的应变过程当中。马尔子、斯蒂夫·郝瑞和我为建立学校而合作。而对于学校以外的环境，各自则自然将其纳入自己的视野，进入各自的专业活动。后来我们又走到一起，不是各取所需、各干各的，而是把羊圈村作为我们共同的田野，不仅为学校的建设，还为整个羊圈村的发展，共同承担羊圈村的困难，共同设计我们的合作题目，共同为人类学田野工作作出新的尝试。

我们的合作具有明显的特点：马尔子是一位彝族学者，又是羊圈村额布家支的一个成员，因而也是一位本土学者。我是祖籍和出生都在北方而生活工作在成都的一个汉族学者。斯蒂夫·郝瑞则是一位与我们不同种族的美国学者。我们的合作可谓不同种族、不同国籍、不同民族、不同地方的人的合作。我们三人虽然是朋友，虽然属于同一研究领域里的观察者，并且面对一个共同的田野和观察对象，甚至有着一致的目标，但是，我们在思想、行为和感情等方

面，都可能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和教育背景的影响，受到特定文化和民族心理方面的一定限制。因而，我们的观察视角、思考的出发点、认识和判断，以及处理问题的方式，都必然会呈现出各种差异和明显的个人特点。面对同样的事物，我们各自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思路和判断。

我们的合作除了调查者与对象角色转换的设计方式而外，还不可避免的包含着我们相互之间的角色转换。我们作为参与观察者，既要求确立自己独立的工作方式，又要主动进行相互之间的沟通工作，包括信息交流、学术对话和感情沟通等等；要求做到相互了解。因而，我们相互都在各自观察和研究的视野之内。我们三个观察者任意一个都同时又成为被观察者；任意一个人的观察研究都受到其他人的监测，同时又为其他人提供参考。

我们预设，通过剖析羊圈村彝族社会的微观形态，来了解整个凉山彝族社会文化的历史变迁。同时，还需通过体验羊圈村的现实生活，通过直接参与冲击和应变的现实过程，来实现自我的角色转换，尽力为羊圈村彝族的发展做一点贡献。

从学科角度上来说，我们当然还十分重视我们的合作本身。我们想通过这种合作，在几个方面做一些尝试。例如，通过各自的视角、认识和判断，来获取羊圈村彝族社会文化百年变迁的可靠信息。寻求各自在观察和认识上产生差异的原由，并从这些原由的理解中对研究本身作出自我审视和判断。寻求合作的“多声部”的和谐。寻求这种“多声部”合作的实际效果，并通过效果反过来检验这种合作。同时，还可以从效果中进一步检验人类学一般方法的有效性和发掘的新方法。一个更深远的追求：我们试图通过不同种族、不同国籍、不同族籍的学者之间的合作，通过学者与羊圈村男女老少的合作，为达到角色超越、地域超越、民族和文化超越的境界而努力。

项目介绍看起信心十足。频频到羊圈活动我们真也不知疲倦。可是，项目研究的声音却随着时间的推延而越来越微弱，以至无语，谁也不提了。乍一看来，这种现象的产生是出自专业技术上的难度，是时间越久需要弄清楚的事情越多所造成的。其实不然。造成斯蒂夫所说的“文本沙漠”实际有很多、很复杂的因素，而所有相关因素似乎都被一个东西所牵系，那就是情感。

现在来想，我们在羊圈发生微妙变化究竟起于何时？我一时还说不上来，不过，我只知道自己心里逐渐改变了原先设定的研究，而老想着这样一个题目：“我与我的彝族女儿”。这个题目和体裁的预设已不纯然是研究了。至于马尔子与斯蒂夫的想法，我不得详知。读了“文本沙漠”才知道，斯蒂夫竟然是因有“反感”的因素而不动作。所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无论有什么具体事件促使我们发生变化，而与羊圈建立了某种感情必定是发生变化的一个绝对的界限。

关于在人类学田野工作范围内的情或情感的讨论，我自己觉得可以从几个角度进行。首先，如果不是初试田野工作者、不是固执偏见者、不是苦于职业升迁或忙碌于名利场者，那么，长时间的田野活动就不可能不发生调查者与对象（人与环境）之间的情感交流，不可能不为某些美好的情感所左右。田野驻足时间短，主、客是分立的，或者说是对立的元素。彼此之间是调查者、采集者与调查对象及资料对象的关系。“我”发现面前无限新奇，似乎立马采集到一大堆可以随意堆砌、剪裁和利用的新鲜资料。写作冲动源于“我”之独立。或许，并不是“我”一时忘记了“我”与“他”的真实关系，忘记了“我”自身的文化出发点，忘记了“他”与“我”一样以“我”有的思想意识和情绪在观察、思考和品评对方，而只是因为时间短，还未来得及触及灵魂深处。时间一长，人性显露，“我”不能不发现、触及对象的精神，不能不发现情绪流露所表白的情感，不能不发现“我”与“他”的镜中面观——“自我”的反观。这样，时间越长，越感受到身在庐山之中，越感受到多样而同一、短暂而又绵绵无绝的生活本身。假使面对“他者”真想去追究什么，那么，越益深入“他者”，就越益深入“自我”的深不可测之处，越益陷入漩涡般的“情”场，无可救药地落入一个只有精神才能瞬间抵达的、而又与精神一样漫无终极的黑洞。

再从某种宇宙观来说，我有这样一种认识：宇宙物质运动构造最奇妙之处就在于，人类文化可以产生文化本身的自觉，精神可以反观精神自身或有自我认识。更奇妙的是这种自觉、反

观或自我认识能生情、动情。这种情仿佛与吃喝拉撒睡乃至性都无关，而是一种纯净、空灵的情，像感情、哀情或爱情，又好像是不为人类所独有的宇宙精神自身的一种无生无灭、无始无终的情。地域、文化、语言让人类产生差别，而“情”或斯蒂夫说的“心系”，却能在差别中通行无阻。在羊圈，在夜晚的灿烂星空之下，每当一曲“|12 22 | 16 6 | 33 56 | 6——|”唱响的时候，即使不用语言工具了解歌词的含义，我们所有人似乎立即彼此理解，一切差别仿佛顿时在踏歌中消融。就此而言，人类生活中所谓“人本”、社会、文化都不重要，唯一重要的是“情”。

最后回到科学研究。我很欣赏肯·威尔伯《万物简史》（《A Brief History of Everything》）中关于“四个象限”、“上帝的两只手”以及“上行、下行”等若干讨论。他描述了科学是如何侵入其他领域的。并指出，关键是“具有侵略性”的科学不仅只追求自身范围内的真理，还能随意“在终极真实上发号施令”，甚至否定其他任何真理的存在。

我认为，“情”一定是一种“终极真实”。我们的田野时间越长，越感到研究“他者”的理念失去效用。当你灵智之门打开的时候，“他者”就在你自身之内。情感成为“他”“我”互让和彼此相认的“场”所。在此经常对科学无话可说。科学企图侵入的唯在情感领域遭到不以为然的抵制。科学在鲜活的生活和情感面前显得刻板、呆滞，暴露出无能为力的局限。

人类学家的田野是一片情感绿洲。科学不可能将其完全囊括。

假如硬是要把分析、研究铺满田野，那只能使田野变得荒芜。田野是完整精神的家园，其“终极真实”不容科学干扰。超越科学的田野当是产生人类学家的精神文本的绿洲。记得这次厦门会议，我借助PPT作了我的《山海经》式的田野研究报告，下来，当我偶与举办这次会议的“老板”王秋桂教授谈到我的报告还缺乏深入研究的时候，他当即回应说：“不用研究，不用研究，研究什么，能走就行了。”他连说了两个“不用研究”。这不是玩笑，是很认真的、耐人寻味的评价。从表面上理解，这是对我提供的资料的欣赏，意思是凭你实地奔走采集的这些资料本身就已经足够了。如果再往深处想，那等于是说：研究是多余的事情，甚至是矫揉造作的行为。“走就行了”，实际是说，只要在真正的生活之中、真正在生活就行了。生活本身是自然的，生活之树是常青的。研究反而会成为一种破坏。

人类学家的田野其实就是人类生活本身。不是不可以或没有分析研究，而是不可以忽略分析研究的盲区——情感和“情场”。斯蒂夫·郝瑞教授的“文本沙漠”最后的表述，应该是他潜心思考获得的最新的灵感，实在让人禁不住为他热烈鼓掌。他说：“真实的参与观察方法可能需要首先通过养成个人‘心系’、社区‘心系’以后，才回到分析。但是此种分析绝对不能放弃所包含的感情。人类的科学化需要是一种承认人情的科学化，而不可能是规律化或客观化。通过养人情的过程，我们可以揭露假的科学，开始发明真的人文科学。”

什么是“养人情的过程”？那不就是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过程——只有真正的人类学家能由此通过。什么是“承认人情的科学化”？什么是“真的人文科学”？这让我想到雨果、贝多芬和卓别林，毋宁说想到文学、音乐和艺术。人类学不仅是联系所有人文科学的媒介，而且就是一块基石。因为人类学的田野——情感绿洲，是广袤而没有边际的，它承载着所有人文学科的精神养料。

自从我与郝瑞教授一同踏入“白鸟上流”或羊圈村，田野活动迄今已经十年。虽然我们还没能实现起初“多声部”演唱的愿望，但是，有我们以上的袒襟表白，也可算是完成了一曲远隔重洋的二重奏。